

台灣佛教日據時期的發展

—試以西元一九〇〇年至一九四五年中、日、臺佛教互動情形為探討範圍

◎游芬芳

一、前言

（一）本文探討的動機

筆者生於臺灣，有感於臺灣佛教的宗教特質與中國傳統佛教有所不同。因而感覺應對臺灣、中國大陸與日本佛教，在日據時代當時互動的情形作一研究：

因為臺灣佛教的現代化比大陸佛教還早，而臺灣興辦佛教教育提高僧材素質，則是從日據時代就開始，其影響並非源於中國大陸鼓山的佛教；所以，身為臺灣的佛弟子，站在本土的立場來思考：如何提高目前臺灣佛教素質？必須對當時的臺灣、大陸與日本佛教，互動的情形，加以探究與釐清此段佛教史實，方能著手改革臺灣佛教，並將佛教發揚光大。

另外，當時臺灣佛教在與民俗信仰的融合與組織形態上，也與江南佛教相當不同。例如：當時臺灣佛教的媽祖、觀音信仰與齋教友的融涉極為普遍；且在臺灣的佛教寺院組織形態上，則登記表有負責人和住持兩欄。從明鄭時代以來，到日據時代，臺灣曾進行土地調查，在清查寺廟財產歸屬時，便有寺院負責人與住持並存的登記。這樣的特色與組織一直持續到今日臺灣佛教，也是臺灣佛教特有的現象。

因日據時代的臺灣佛教許多問題，皆是與當時的「時、空背景」和「中國大陸」及「日本佛教」，互動而產生的。而且，當時的臺灣佛教又息息相關於今日的佛教，所以，臺灣佛教史是值得吾人研究與探索的，這也是筆者寫作此論文的原因了。

（二）本文之範圍與內容

由於西來庵事件後，臺灣佛教僧侶、齋友先後加入了日本曹洞宗、臨濟宗的宗籍，以至於有曹洞宗的「臺灣佛教青年會」，及臨濟宗的「臺灣佛教道友會」之成立；這在日後臺灣佛教圈內，有著重要的影響。而，對於臺灣、中國大陸佛教的互動情形，鼓山受戒與大陸僧人來臺情形與當時的臺灣佛教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

筆者於本文試以西元一九〇〇年至一九四五年，來探討「臺灣、中國大陸與日本佛教互動的情形」。由於探討的時間範圍長達四十五年之久，故寫作的內容，除了參考老師上課資料，及筆者所搜集的史料之外，為免內容過於龐雜贅述，故內容鎖定為：

臺灣與日本佛教的互動情形：西來庵事件後臺灣佛教的影響。善慧法師的崛起與貢獻。本圓法師的影響與貢獻。

臺灣與中國大陸佛教的互動情形：鼓山受戒與臺灣佛教。大陸僧人來臺情形與影響。

二、「西來庵事件」與「南瀛佛教會」的影響

（一）西來庵事件之狀況

西元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四月，臺灣經歷了對日本人的最後、且以齋教為中心的最大武力革命事件，稱之為「西來庵事件」。因主角是余清芳，所以也稱「余清芳事件」。

此叛亂長達一個多月，在最後的決戰（大正四年八月三日）吧嘍支廳南庄派出所的包圍戰中，依一九七五年鄉公所的調查，當時的犧牲者，即被軍隊、警察殺害的住民、死刑、服獄的，計有六百八十八名，當時人口推定為四千人左右，所以是相當慘烈的抗日事件。

由於事件發生係與在家佛教（即齋教）有密切的關係，故當時的總督安東貞美就從十月至翌年三月，實施全臺灣的宗教調查，但此次的調查由於準備欠周詳，故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而於大正五年之後，又連續作二次全臺的宗教調查工作。繼之，於八年三月丸井圭次郎等加以整理，歷經四年時間完成了第一卷的《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此卷的內容是，依臺灣的舊慣而與宗教有關的事物。

丸井圭次郎在長達六年半的課長任內，其重要的貢獻是結合了臺灣佛教界的精英而成立的「南瀛佛教會」。由於此佛教會是超越了內地、本島各山派及僧俗的組織團體，而且它自成立以來一直繼續到戰後政府遷臺，而中國佛教會取代為止。所以可以認為「南瀛佛教會」是此一時期臺灣佛教活動，的一個良好指標。

（二）成立「南瀛佛教會」的概況

丸井氏於社寺課長任內，驚歎本省佛教萎靡不振，一般佛教徒生活水準不能與人並肩且有落人之現象；而為促進臺灣佛教之振興，以謀啓蒙全臺信佛民眾與安寧幸福，並為宗教政策上及宗教信仰，乃至思想教導上；對於黃玉階曾擬的「本島人宗教會規則草案」，即對於組織全臺灣佛教團體之事，甚為關心。其後竟由其手創設「南瀛佛教會」。因丸井社寺課長的六次籌備而與創立委員，於大正十年四月四日正式成立「南瀛佛教會」：

此創立時間與江燦騰的看法和李添春的《臺灣省通志》的記載有所不同。

從「西來庵事件」爆發到「南瀛佛教會」的成立，共計六年多的時間（一九一五—一九二一），除代表總督府方面的丸井宗教事業之外，還涉及到善慧法師與日本在臺曹洞宗寺務當局、本圓法師代表日本臨濟宗的合作關係，以及大正時期新佛教運動的興起；這種種的因緣際會，說明了當時的臺灣與日本佛教的互動情形。至於善慧、本圓二法師的崛起與貢獻，是具代表意義的；此將於第三部分進行探討。

（三）南瀛佛教會對臺灣佛教的影響

《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丸井圭次郎說明了當時的臺灣佛教情形：

……臺灣之佛寺，凡（皆）屬福州鼓山之末流，而鼓山湧泉寺，乃以禪之系統與淨土思想混合者（融合淨土思想的流派），故臺灣佛教混帶天台華嚴之臭味

者鮮鍊矣。（若）試探其教義（所在），云：「上機之人以（藉由）參禪修行而可見性成佛。然此世界，多逆緣退境，修業難行，故不如依彌陀之願力，往生順緣勝境之淨土……」

故，丸井氏說出了，當時臺灣佛教寺院僧眾多主禪淨雙修，雖遠赴鼓山受戒，返臺之後也只依樣在佛龕前看經禮拜而已：

凡本島僧侶上乘者，皆遊鼓山，以致彼等不敢司說法佈教，只一樣於龕前看經禮拜而已。……其奔於極端者，或焚指供佛，或自損生命者不少。

何況能赴鼓山受戒之優秀僧侶是極少數，大多數的僧侶是無學無識之徒，或晚年孤獨，或貧困，才投身於佛寺者。

故南瀛佛教會注重僧侶的佛學教育，雖然它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顯有以總督府的政治手段，來主導臺灣佛教變革的企圖心。不過由於其手段是從教育僧侶著手，且從其所安排的講習科目，可以窺知其對臺灣僧侶的教育，從身邊有關的日常課誦經典的了解開始，到身為布教師應有的知識修養為止，都符合了「南瀛佛教會」成立的目的。

故歸納其對台灣佛教的影響；至少有下列數種：

- （一）提昇了臺灣佛教傳教者的教育水準，青年受宗教教育，活躍於社會者有逐漸增加之勢。如在大正十四年末的調查報告中，經認可的布教師就有六十一位。又留學於日本的佛教青年亦不在少數。
- （二）促進臺灣佛教僧侶辦學的風潮。
- （三）南瀛佛教會是全島唯一超越宗派的機關，也是聯絡各寺廟的機構，且具有團結佛教組織之功能。
- （四）參與了入世的社會活動，有具體事相；且開啓了現代佛教新思潮與事業。

三、善慧、本圓二法師的崛起與貢獻

（一）善慧法師與臺灣佛教青年會、臺灣佛教中學林

「西來庵事件」爆發後，在「臺灣佛教青年會大演講會」促成「臺灣佛教青年會」的成立和隨後「臺灣佛教中學林」的開辦，其中善慧法師所任的角色，及其涉及的台、中、日互動關係，就更突出了大正時期，新佛教運動清楚的狀況。

善慧法師與臺灣佛教青年會

於大正六年五月十七日召開發起人會議；當時任會長是「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別苑」的負責人「大石堅童」。而善慧法師則是業務的實際執行者。可見在此一新組織中，他已是臺籍僧侶中最令人注目者。

善慧法師與臺灣佛教中學林

「臺灣佛教中學林」，是曹洞宗「台北別苑」第七任佈教總監大石監童，在任內極力促成的。大石堅童與善慧法師結緣甚深。因此「臺灣佛教中學林」的創辦，他自任「林長」，委由善慧法師任「學監」。於大正六年四月一日正式創校。成立基金是當時的一萬元，江

善慧（善慧法師）僅出資一千七百元；但基隆月眉山靈泉寺資料，卻只見創辦人是善慧法師一人而已，這是需要釐清的。創辦者是結合僧侶與齋友，而總本山的補助最大。

初期招收的學生中，出家僧侶和在家信徒各占其半。教授八人，臺籍僧侶和日僧亦各占其半。善慧法師的出家弟子，即有四人在「中學林」就讀。善慧法師的大弟子德融則任教授、四個日籍教授，就有二人從「曹洞宗大學林」畢業來臺。大正十一年擴建校舍，改稱「私立曹洞宗中學林」。昭和十年（一九三五），採五年制，又改名為「私立台北中學」。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學生增加，男生移至士林新址，原址改稱「修德實踐女子學校」。戰後，再易名為「私立泰北高級中學」。是臺灣教界所辦歷史悠久的一所中學。

善慧法師與太虛大師之中、日、臺關係

善慧法師在靈泉寺因新建「三塔」完成，要舉辦七壇水陸大法會，便在大正六年秋末，邀請岐昌法師和圓瑛法師來臺聯合主持。但圓瑛法師臨時有事，遂改太虛大師來臺。所以，太虛大師在最後一天，和日本僧侶輪流演講佛法。他不諳台語，故由善慧法師翻譯。他在台期間最大的收穫，是和「中學林」的教授，談及日本佛教的學制和課程。同時也由德融法師教他研讀日本文語，以及由熊谷泰壽告知日本近代佛教的發展及學者成就。

這對太虛大師回大陸後的佛教改革事業，如「武昌佛學院」的創設，有極大的幫助。這使臺灣和日本的佛教經驗，得以回流到中國大陸，並產生影響。

（二）本圓法師的崛起與貢獻

本圓法師與日本臨濟宗

本圓法師生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一九〇〇年出家於鼓山湧泉寺振光老和尚座下；一九〇一年攜弟子覺淨師返臺省母；翌年又回湧泉寺。一九〇八年返臺，並受善慧法師之請，由聖王公廟遷往月眉山靈泉寺任當家。而後接掌凌雲禪寺的前七年（一九一〇—一九一七），並不很熱衷自立一派。後與臺南開元寺於一九一七年加入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是欲與善慧法師相抗衡之故，最後竟發展出觀音山這個法脈系統。

本圓法師離開所依的月眉山組織後，於大正七年四月遇契機。日本妙心寺派本山指派長谷慈圓師來臺駐錫，言欲效法曹洞宗在臺佈教方式，積極計劃建設，擬將事業分為教育、佈教、宣傳三個部門。

本圓法師與「臺南佛教道友會」、「鎮南學林」

創立一所「道場」，訂名為「鎮南學林」。是專為教育「僧侶，齋友」等之弟子。同時，另再倡議，成立「臺灣佛教道友會」。而「臺灣佛教道友會」和「臺灣佛教青年會」的起草人，同為林普易。該會於民國七年，經臺灣總督府批准認可。會長為日人，中川小十郎，副會長為日人長谷慈圓，評議員有林熊徵及日人丸井圭次郎等三十三人，總幹士為日人小倉文吉，幹士有本圓、許丙等九人。該會以演講及發行道友會報宣傳佈道。

當時的本圓法師已加入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並憑著他多年協助善慧法師乃至曹洞宗各種建寺、傳法活動所累積的人脈與經驗，總算為自己觀音山法脈的拓展踏出了第一步。

而在大正十年所成立的「南瀛佛教會」善慧法師代表的曹洞宗、本圓法師代表的臨濟宗，自此本圓法師不再僅是善慧法師的助手，已成獨當一面，可與善慧法師平起平坐的，臺灣佛教重要的領袖人物了。

本圓法師與傳戒

本圓法師的凌雲禪寺首次傳戒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戒期一週，但四眾弟子卻有七百多人之多。傳戒大和尚除由本圓自任外，羯摩和尚則是來自鼓山湧泉寺的聖恩老和尚，教授和尚則是首次來臺的圓瑛法師。善慧則任導戒師，大岡山永定師為授經師。其他的戒師還有得圓法師、捷圓法師、日人鈴木雪應、伊東大器等。這也是當時中、日、臺佛教互動的情形，使得本圓法師與凌雲禪寺的聲望到達最高，兩年後（一九二五）代表臺灣佛教訪問日本佛教聯合會，並在民國二十三年（昭和八年）遊南洋及印度佛教聖蹟。

四、臺灣與中國大陸佛教的互動情形

（一）鼓山受戒與臺灣佛教

大正四年發生西來庵事件，因此臺灣許多寺廟紛紛加入日本佛教系統以求保護；當時臺灣佛教四大派系也都隸屬日本「曹洞宗」和「臨濟宗」，而四大派的開山祖師，除法雲寺的覺力法師是大陸來臺的僧侶之外，其他三大派皆是臺灣本地僧侶，雖受戒人數稀少，但受於鼓山湧泉寺者居多。由於篇幅的關係，僅能概要說明：

月眉山靈泉寺：善智法師、善慧法師。

觀音山凌雲禪寺：寶海、本圓、覺淨法師。

大湖法雲寺：妙果法師。

臺南開元禪寺：榮芳、義敏、玄精、傳芳、得圓、捷圓等諸法師。

他們皆是遠赴鼓山受戒，且在日本統治期，開創一大宗派的僧侶。

（二）大陸僧人來臺情形與影響

苗栗大湖法雲寺派的覺力法師（一八八一—一九三三），是日據時代臺灣佛教四大派中，唯一來自大陸福建，而在臺灣發展成一大派系。一九〇九年，師首度來臺，不久，又返鼓山任首座、監院。一九一三年第二次來臺，於苗栗創法雲寺。

依據《覺力禪師傳承源流考》所記載：

「考曹洞宗傳承，覺公一系乃福建，鼓山元賢而來。鼓山元賢與博山無異元來同門，源自壽昌慧經一派。慧經之師承稟山蘊空常忠，忠師事大章宗書。」

覺力依鼓山湧泉寺萬善老人出家，字號「復願，是屬於曹洞宗的「復」字輩，與虛雲「古」巖、圓瑛「今」悟，同是妙蓮「地」華的戒子。民國六年，日本曹洞宗在臺北別苑，成立「臺灣佛教青年會」、「臺灣佛教中學林」時，除本文已提及的善慧、本圓法師之外，覺力法師亦積極參與募款活動。

師依叢林體制，行百丈清規；又開辦：法雲佛學社、研究院、香山特別講習會與女眾

佛學院，培養弘法人才，更推動各項社會慈善事業，於是法務大興。駐臺二十年，七次傳戒。對當時臺灣佛教教育的推動，成效卓著。

五、結論

西來庵事件後，臺灣佛教僧侶、齋友先後加入日本的曹洞宗、臨濟宗的宗籍，以致於有臺灣佛教青年會（曹洞宗）及臺灣佛教道友會（臨濟宗的成立）；如此的發展，造成日後臺灣佛教極大的影響，而演至於今日的臺灣佛教面貌。

因日據時期，日本佛教在臺灣實行皇民化運動，也利用宗教的力量來進行布教活動。對臺灣所產生的正面影響是積極的培養僧才、辦學教育、提昇僧格。而鼓山湧泉寺在日據時期僧格低落、不重僧侶教育、修行也極為消極；所以提及臺灣佛教的僧侶教育，它不是來自鼓山的佛教，而是因為臺灣在日據時期，尤其是大正四、五年間爆發的西來庵事件有極為直接的關係！

由於筆者自己是學佛者又是臺灣人，故對於臺灣佛教史有濃厚的興趣；但由於日據時期的史料散落，被一般人誤解的地方太多。基於如此，筆者未來若欲進一步探討臺灣佛教史，則可能須注意：

- （一）現代臺灣佛教的發展，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乃是由過去、現在的政治、經濟和環境背景所促成。
- （二）依循學理、站在本土的立場研究，應注重當地的文化和風俗習慣，不能以傳統的江南佛教眼光來探索臺灣佛教。（例如：臺灣佛教的一特質是與民俗信仰融合的佛教：善慧、本圓法師等，早年皆出生於齋教。直至目前，出家眾有多人早先是民間信仰者－例如：班上五位出家眾有三位是。而筆者家屬皆是拜媽祖、觀音、土地公的佛教徒。）
- （三）臺灣目前所流行的「人間佛教」思想，其特徵是將佛教積極地參與社會人群的教化工作。這思想是「太虛大師」所提出，但臺灣佛教在日據時期已有思想雛型，但未見具體化。
- （四）中、日、臺佛教史的三角互動關係，在學界仍是有待開發的重要關卡，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 （五）由此篇論文發現，日本僧侶對社會的反應較臺灣、中國僧人敏感。積極的對應時代、參與社會教育的工作，是我們身為臺灣佛弟子所要努力學習的課題。